

1927-1937年上海的黨、政府與工商界

● 白華山

安克強的《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權、地方性和現代化》一書在兩個方面獲得突破：一是從上海城市現代化的角度，考察了上海市政府30年代在城市發展、教育和公共衛生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二是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角度，詳細研究了上海市政府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資產階級的關係。



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著，張培德、辛文鋒、蕭慶璋譯：《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權、地方性和現代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法國著名學者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的《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權、地方性和現代化》(*Shanghai 1927-1937: Municipal Power, 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是西方學者研究上海史的名著。它是安克強在其

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的，1991年出了法文版，1993年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該書出版後，歐美學界好評如潮，當時學者稱其為「用英文撰寫的對民國時期上海市政府研究最為出色的一部著作」(Terry Narramore, review of *Shanghai 1927-1937: Municipal Power, 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410-12)。澳大利亞學者馬丁 (Brian G. Martin)、美國歷史學家顧德曼 (Bryna Goodman) 等人指出，安克強的研究在兩個方面獲得突破：一是從上海城市現代化的角度，考察了上海市政府在二十世紀30年代在城市發展、教育和公共衛生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學界對國民黨政權「無可救藥的腐敗和沒有成效」的刻板認識；二是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角度，詳細研究了上海市政府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資產階級的關係，認為二十世紀30年代上海資產階級在上海政治中仍保留着他們的特權和發言權，這就修正了美國學者科布爾 (Parks M. Coble) 在《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一書中提出的「1927年後上海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被閹割」的觀點 (Brian G. Martin, review of *Shanghai 1927-1937: Elites local et modernization dans la Chine nationalist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8 [July 1992]: 217-19; Bryna Goodman, review of *Shanghai 1927-1937: Municipal Power, 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 2 [May 1994]: 532-33)。當然，在內容和結構上，這本書也並非盡善盡美，如在時段上偏重於前五年 (1927-1932)，對於後五年論述比較薄弱，對於租界與上海市政府的關係還有待深入，但瑕不掩瑜，這本書無論是對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政治，還是民國城市的發展，都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本書的學術特色還是體現在作者從地域層面上對當時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分析上。二十世紀20、30年代，上海地方政治中活躍着三股目標追求各異的利益實體：市政府、市黨部和工商界。從市政府與市黨部的關係看，形式上二者平等制衡，互相監督，但事實上為爭奪權勢資源二者卻時起衝突；從工商界與市政府的關係看，二者在治理上海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在財政稅收等方面卻又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和摩擦；從工商界與市黨部的關係看，前者追求的是實業的發展和保證這種發展的良好秩序，後者在致力黨務的同時又極力謀求黨權的擴張，在很

多時候二者存在着嚴重的利益衝突。可以說，工商界、市政府、市黨部三者的關係糾纏交錯，構成1927-1937年上海政治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

綜覽全書，儘管三者關係糾纏，頭緒繁多，但依然有迹可循。筆者認為，以下幾個因素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三者之間的關係：

第一，上海市的地位和特點。

二十世紀30年代，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城市，是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無論是工商業還是教育、科技、新聞、文學等都領先全國。上海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優越地位，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特別關注。蔣介石在1927年上海特別市成立典禮上就曾說：

上海特別市乃東亞第一特別市，無論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問題無不以上海特別市為根據……上海之進步退步，關係全國盛衰、本黨失敗，不能不切望全體同志聯合起來，協助建設。(〈國民政府代表蔣總司令訓詞〉，《申報》，1927年7月8日)

作為南京政府的賦稅重地，上海工商業的主體——工商界自然也成為中央和市政府倚重的對象，如上海市長黃郛在就職演說中所言：「蓋欲造成繁盛之都會，優美之環境，不能僅僅責蓋於政府，而最健全與穩固之進步，仍在全民之自致其力也。」(〈黃市長就職演說〉，《申報》，1927年7月8日)可以說，維護上海的優越地位，把上海建設成為

在上海華界紳商進行市政管理與設施的改革和建設的過程中，市民的公共意識和義務觀念逐漸萌發，最後擴展為對所居城市的集體認同。而在市民的記憶中，「歷來主持市政之人，率皆以政局轉變為進退，各抱五日京兆之心」，而上海又為「東南最繁盛之區，市政設施關係中外觀瞻」，這可以說是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後工商界「市長民選」的呼籲不斷的主要原因。

1905年起，上海紳商開展了修橋、築路等市政建設活動，率先在全國拉開了地方自治的序幕，華界面貌大為改觀，但是，地方自治畢竟是政府權力架構之外的活動，它的存在，既分割了政府權力，又影響着政府在民眾中的權威。因此，南京國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在給市民自治一定支持的同時，又對其作出了種種限制。

「中國各地之模範」(〈國民政府代表蔣總司令訓詞〉，《申報》，1927年7月8日)，成為工商界與市政府進行合作的紐帶。

上海市最主要的特點是三界並立、華洋雜處。其中，租界固然是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經濟文化侵略的產物，但它卻帶來了與中國傳統文明迥然相異的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強大的文化「勢差」刺激下，上海華界的士紳商人仿效租界成例，有意識地進行市政管理與設施的改革和建設，開展了鋪路、修橋、開辦路燈、鋪設自來水等活動，在此過程中，市民的公共意識和義務觀念逐漸萌發，最後擴展為對所居城市的集體認同，對城市命運的集體關注。而在市民的記憶中，「歷來主持市政之人，率皆以政局轉變為進退，各抱五日京兆之心」(〈四商會電主市長民選〉，《申報》，1927年9月15日)，而上海又為「東南最繁盛之區，市政設施關係中外觀瞻」，這可以說是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後工商界「市長民選」的呼籲不斷的主要原因所在。

但是，上海華洋並峙的局面，卻又給市政府的市政管理和建設帶來極大不便。僅以稅賦徵收為例。由於近代中國戰亂頻仍，而上海尤其是租界卻相對平靜，因此，「這就形成了工業集中於上海的趨勢。許多本應遷出或開設在原料產地的工廠都在滬設廠。雖然運費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海特別是在租界內，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擾」(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

院出版社，1985]，頁278)。工廠、金融等集中在租界，使得上海市政府失去很大一部分稅收，而這部分工業家、銀行家卻成為市政府建設討論委員會、財政討論委員會的委員，成為市政府稅收政策的主要諮詢者，而稅收的主要承擔者——華界中的中小商人，卻被排斥於市政府的議事機構之外。市政府這種南轅北轍的財經政策固然是引發徵稅風波的主要因素，但根本上還是由華洋並峙、行政不統一的特殊城市格局造成的。

第二，地方自治的傳統。在西方自治思潮的影響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從1905年起，上海地方紳商開展了修橋、築路等市政建設活動，率先在全國拉開了地方自治的序幕。上海地方自治運動持續開展了九年，至1914年3月停辦。1923年6月，地方自治開始恢復，1926年走向衰落，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民間意義上市民自主的地方自治運動不復存在。通過地方自治運動，華界的面貌大為改觀，與以前相比，在市政、教育、慈善、衛生等方面與租界的差距在縮小。可以說，地方自治運動是一項給市民帶來實惠的運動。儘管1927年地方自治不再，但作為一種長久的傳統，地方自治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慣性，成為沉澱在市民內心深處的集體記憶。可以說，1932年後上海市一些重要的商人團體如上海市地方協會開展的活動，實則是對地方自治傳統的操演，是自治的社會慣性使然。

自治作為一種傳統和資源，在1927年後的上海社會得到尊重。市

政府吸納上海工商界主要人士參加上海特別市參事會、建設討論委員會、財政討論委員會、臨時市參議會等市政組織，就行政事務向他們諮詢，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工商各界「市民自治」的籲求。在淞滬戰後重建中，市政府又給予工商界參與地方治理的活動以合法性支持，使得地方自治精神得以延續。但是，也應當看到，地方自治畢竟是政府權力架構之外的活動，它的存在，既分割了政府權力，又影響着政府在民眾中的權威，因此，南京國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在給予市民自治一定支持的同時，又對其作出了種種限制，這可以說是1927年以後工商界參與市政決策權力又極其有限的原因所在。

第三，社會整合方式和政治控制空間。1927年前的上海社會，地方政府統治能力有限，治理上海社會的重任由上海總商會等地方精英組織的民間團體擔負起，從社會整合方式看，上海社會運行是通過民間團體協調自律而非政府主導進行的。但是，隨着國民黨政府的建立和「以黨治國」政策的推行，蔣介石政府開始向上海社會進行權力滲透，包括上海總商會等在內的工商團體被強制改組，地方自治的主要活動領域也被市政府接管，這表明上海社會整合方式開始由民間團體之間的協調自律轉向由政府強制執行。

社會整合方式的變化，表明國民黨政府對上海社會控制的加強，但這並不意味着窒息了工商界參與上海地方治理的空間。事實上，「九一八」事變後，在民族主義運動

的衝擊下，市政府、市黨部發生的權威危機，則直接導致國民黨政府在上海地方社會控制的鬆懈，這就為工商界參與地方治理提供機會和比較寬裕的空間。淞滬戰後，南京政府和上海市政府須要重建自己的權威，但卻面臨着政治和財政的雙重限制，而且政府不能無視工商界在戰時所作出的貢獻，因此，吸收上海工商界人士參加上海地方議事機構，給予工商界的民間事業以合法性支持。但是，工商界和市政府的合作是有限的。隨着中央集權的完成和政府着力重建權威，工商界的活動又受到市政府和市黨部的壓制。

第四，角色定位和利益訴求。這是理解市黨部與市政府、工商界關係的一把鑰匙。從市黨部與市政府的關係看，在國民黨「以黨治國」的政策影響下，市黨部秉持着「黨權高於一切」的理念極力擴張黨權，不但屢屢干涉地方行政，還以「提高黨權、鞏固黨權」為名加強對上海民眾運動的領導權，並且是取消商會提案的提出者和堅定執行者。但是，國民黨中央地方黨政分治原則的推行，以及經濟上的不自主，使得市黨部以黨馭政的願望愈來愈渺茫，事實上，1931年後，市黨部的活動也愈來愈局限於黨務方面。從市黨部與工商界的關係看，這裏出現了角色定位的衝突。市黨部把自己看作是「以黨治國」政策的執行者，而工商界追求的是實業的發展和經濟利益的實現，他們渴望的是一個穩定的、可自由發展經濟的環境，而黨治則意味着把一切納入黨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進入

在國民黨「以黨治國」的政策影響下，市黨部極力擴張黨權，把自己看作是「以黨治國」政策的執行者，而工商界追求的是實業的發展和經濟利益的實現，他們渴望的是一個可自由發展經濟的環境。黨治意味着把一切納入黨的意識形態，可以運用軍事、政治、思想等手段干預經濟活動，這可以說是工商界和市黨部頻起紛爭和衝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經濟領域，則意味着國民黨可以運用軍事、政治、思想等超經濟手段干預經濟活動，這可以說是工商界和市黨部頻起紛爭和衝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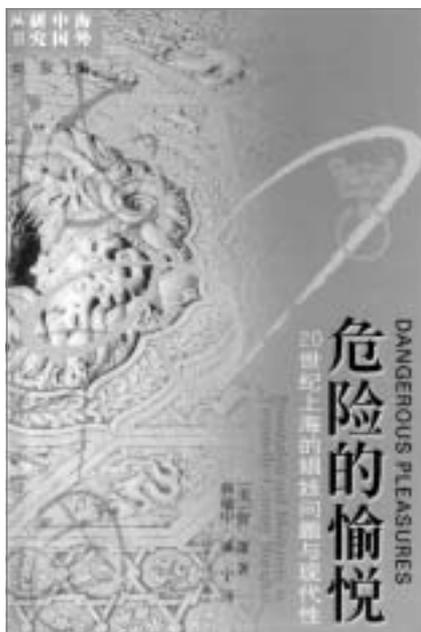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工商界、市政府、市黨部的關係的演變是受多種因素制約的，其實際表現形態是比較複雜的。黨、政府、工商界，如何界

定自己的角色身份，如何協調好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上海城市現代化建設中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可以說，安克強教授對三者關係的探討，開創了一個饒有趣味的研究課題，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民國上海社會的認識，同時，對於我們今天建構新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也具有借鑑意義。

重構綺麗的歷史碎片

● 侯杰、李釗

賀蕭教授所撰的《危險的愉悅》一書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瓊·凱利婦女史著作紀念獎，這是歷史學會首次將該獎項授予研究美國以外地區婦女歷史的作品。作者筆下所展現出的妓女享有自己的私人空間，與廢娼運動中所描述的受難者形象完全不同；也與二十世紀初出版的「指南書」所描寫的，娼妓是使男人受難的施動者形象有所不同。



賀蕭 (Gail Hershatter) 著，韓敏中、盛寧譯：《危險的愉悅——二十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賀蕭 (Gail Hershatter)，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歷史系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她所撰寫的《危險的愉悅——二十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一書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瓊·凱利婦女史著作紀念獎 (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 in Women's History)，這是歷史學會首次將該獎項授予研究美國以外地區婦女歷史的作品。該書漢譯本是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的一部重量級著作，出版後對於大陸學者正在興起的社會性別史的研究熱潮產生積極的影響，隨後也掀起了婦女、媒體、記憶等後現代主題著作的出版熱潮。海內外多位學者，如台灣學者李孝悌，都對此書給予很高評價。